

我們的意見分歧

普列漢諾夫著

人民出版社

我們的意見分歧

普列漢諾夫著

劉若水譯

243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СОЦИАЛИЗ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8

本書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八年版譯出
（“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未譯）

我們的意見分歧

普列漢諾夫著

劉若水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685·850×1168 $\frac{1}{32}$ ·9 $\frac{3}{8}$ 印張·209,000字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3,000 定價：1.00元

目 錄

給彼·拉·拉夫洛夫的信(代序)	1
導言	19
(一) 人們怎樣責備我們	19
(二) 問題的提法	23
(三) 赫爾岑	25
(四) 車爾尼雪夫斯基	28
(五) 巴枯寧	49
(六) 特卡喬夫	58
(七) 結論	65
第一章 一些歷史資料	71
(一) 俄國的布朗基主義	71
(二) 吉荷米洛夫	74
(三) “勞動解放”社	85
(四) 在和“勞動解放”社鬥爭中的吉荷米洛夫先生	92
(五) 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	97
(六) 資本主義在西方的發展	108
第二章 俄國資本主義	124
(一) 國內市場	124
(二) 工人人數	130

(三)家庭手工業者	140
(四)家庭手工業和農業	149
(五)家庭手工業者和工廠	152
(六)俄國資本主義的成就	154
(七)銷場	158
第三章 資本主義與公社的土地所有制	160
(一)農業中的資本主義	160
(二)公社	162
(三)我國公社的分化	166
(四)民粹派的理想的公社	177
(五)贖地辦法	189
(六)小土地所有制	199
(七)結論	200
第四章 資本主義及我們的任務	203
(一)行將到來的革命的性質	203
(二)“奪取政權”	228
(三)“人民”革命的可能後果	237
(四)吉荷米洛夫先生在布朗基主義和巴枯寧主義之間的搖擺	255
(五)社會主義者奪取政權的可能後果	268
第五章 俄國社會主義者的真實任務	271
(一)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打耳光”	271
(二)在工人中間的宣傳	282
第六章 結論	295

給彼·拉·拉夫洛夫的信(代序)

可敬的彼得·拉夫洛維奇：

您不滿意於“勞動解放”社。在“民意導報”第二期上，您對該社出版物特別作了評論，雖然這一評論很短，但是它所佔的兩頁半篇幅，已足以表示您是不同意該社的綱領和不滿意該社對“民意黨”的態度的。

我向來尊重您的意見，此外，我也知道，我們的各種色彩和各種派別的革命青年，是如何注意您的言論，可是現在我大胆地說幾句話來為“勞動解放”社辯護，我認為您對它是不十分公道的。

我更認為自己有權利這樣做，因為您在您的評論中主要是談我的那本小冊子“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的。是這本小冊子引起了您的責難，而由小冊子的作者出來回答，自然是最適當不過的。

您認為這本小冊子可分為兩部分，按照您的意思，“對這兩部分，應當分別看待”。其中一部分，“即第二章，是值得像對一切有關社會主義問題的重要著作那樣地予以注意的”。您說，另一部分，即小冊子的大部分，都是花費在反對民意黨（您的雜誌就是想做它的國外機關報）過去和現在的活動的論戰上了。您不僅不同意我在我的那本小冊子的這一部分內所發表的意見，而且就連“反對民意黨的論戰”這一事情的本身，您也認為是應該予以嚴厲斥責的。您以為“不難向普列漢諾夫先生證明，他的抨擊可以用極充分的理由來加以

反駁，尤其是——或者由於匆忙吧——他引證得不精確”。同時您又深信，我“自己的行動綱領含有的缺點和不切實際的地方也許比我所非難民意黨的還要多”。但是您沒有空閒的時間來指出它們，這是使我非常引以為憾的事情。照您的說法，“民意黨的機關刊”是致力於反對俄國人民政治的和社會的敵人的鬥爭的；這一鬥爭是這樣複雜，要求您拿出“所有的時間、所有的力量”。您是“既無暇時，又不樂意”把您的出版物的一部分篇幅用在“論戰上來反對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派別，而這些派別却認為和‘民意’論戰要比對俄國政府、對俄國人民的其他剝削者作鬥爭更合時宜”。您既然期待着時間本身會對爭論的問題作出有利於您的解決，因此，您就認為公開打擊一個其多數分子很快就可加入民意黨隊伍的派別，來把您和勞動解放者們*——您喜歡怎樣稱呼我們，就怎樣稱呼我們罷——的“不太大的意見分歧加以強調”是沒有益處的。據您看來，使“勞動解放者”變為民意黨人的可能性很大，因為，據您說，“普列漢諾夫先生本人，如他在他的小冊子的序言中所表明的，在自己的政治和社會信念中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演進”，而您“有理由希望”，我這方面“會朝這同一方向繼續前進”。當我的“演進”到達了您所認為顯然是現今俄國社會主義發展所能達到的最高點時，您希望我可以體會到對共同敵人作戰的社會軍隊中每一個集團的實際任務的一方面：這就是說，體會到“可以破壞這一支軍隊的組織的——即使你看見或假定這支軍隊裏面有某些缺點——也只限

* 關於您所想出的這個名稱，我順便表示如下的意見：“勞動解放”是我們社的名稱和口號。但是以“勞動解放者”社一語來稱呼“勞動解放”社便是有違字法措辭不當。試用一個例子來說明。您的同志們關於“人民統治”談得很多；只要稍為遵循邏輯，他們應當同意，他們“黨”的名稱——“民意”，也不外是一個號召，表示要實現和人民統治一詞有關的那種政治制度。但這是否說，他們可以自命為人民統治者呢？

於或者是這一支軍隊的事業上的敵人（而您並沒有把我算在他們之內），或者是一個靠自己的活動、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在當前歷史時機能成為社會軍隊的集團”。但是，“勞動解放者”這一集團要起這樣的作用，按照您的意見，還“在遙遠的、而且大概有點成問題的未來”，因為他們本身還沒有完成自己的蛻變過程，現時還只是相當於民意黨的蛹或幼蟲而已。

可敬的彼得·拉夫洛維奇，這就是您關於我的小冊子所說的話的內容，我幾乎是一字不易地轉述的。或許，我從您寫的評論中引用這麼多，已經使您厭煩，但是，一方面我怕受到新的責難，說我“引證得不精確”，而另一方面我又認為不妨把您的話全部告訴讀者，因而使他們便於對我們的爭端作出最後的判決。您知道，讀者大眾是自由的“文壇共和國”內所發生的一切爭論的主要的、最高的審判員。所以雙方都應當採取一切措施來向讀者大眾說明爭論問題的真實性質，這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在述叙了您對我的小冊子的意見以及您關於“勞動解放”社對“民意黨”所採策略的一些看法以後，可敬的彼得·拉夫洛維奇，我現在就要作一些解釋，沒有這些解釋，要正確地理解那種使我和我的同志們這樣行動而不是那樣行動的理由，便是不可能的。

其實，我可以承認，一切關於這類理由的話實在是多餘的，而讀者可能對它很不感興趣。何以見得呢？難道關於目前的任務、策略以及科學地論證我們革命者全部活動的問題不是我們俄國社會生活中最重要而最迫切的問題嗎？難道這個問題已經可以認為是最後地、無可爭辯地解決了嗎？難道每一個革命作家不應當盡自己所有的一切力量、所能集中的全部注意力來幫助闡明這個問題嗎？或者只有當這種闡明能使人相信俄國的革命者雖然不像教皇那樣

永久都對，然而在自己的實際行動中並沒有一個過失，在自己的理論議論中也沒有一次大錯，無論在那一方面都“百事大吉”的時候，這樣的闡明才算有用。或者沒有這種愉快信心的人就不該發言，而當他們每次拿起筆來指陳革命事業是怎樣在進行，現在依他們的意見應當怎樣進行，以期喚起革命者的注意時，他們動機的純潔就成了問題嗎？斯賓諾莎早在十七世紀時就說過，在自由的國度中，每個人都應當有愛怎樣想就怎樣想和怎樣想就怎樣說的權利，而在十九世紀末，在社會主義的政黨中間，那怕是歐洲最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的政黨中間，這種權利竟被人懷疑，這是可能的嗎？俄國的社會主義者既在原則上承認了言論自由的權利，並把這樣的要求列入自己的綱領，他們就不能只讓那一自命為在當前革命運動時期有領導權的“黨”派來享受這種權利。我以為現在，當我們的合法出版的書籍正在遭受着最無情的迫害，而我們祖國內思想領域以及一切其他活動領域中“所有活的東西、所有誠實的東西都在被剷除”的時候，我以為在這樣的時候，應當請一個革命作家解釋的，是他何以沉默，而不是他有某一著作問世。假如您同意這個意見，——而不同意是不大可能的，——那末，您也會同意，不能把一個為“人類言論自由的尊嚴”（赫爾岑的名言）而須冒重大犧牲的作家兼革命家，指責為口是心非。假使如此，那末他如果公開、老實而不含糊地說出他對於革命活動中這些或那些綱領的想法，我們能責怪他嗎？我相信，可敬的彼得·拉夫洛維奇，您對這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使得我這樣相信的，除其他的一切之外，還有您署名的“民意導報”的發刊聲明，在該報第八頁上我們讀到如下的話：“社會主義，和任何一個歷史上的重要的思想一樣，不免要在自己的信徒中間引起很多的，雖然不是特別重大的意見分歧，

在它（社會主義）裏面，有許多理論的以及實際的問題，仍然是有爭執的。由於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比較複雜，困難較多而且歷史較短，在俄國社會主義者中間觀點上比較顯著的分歧可能就更多些。但是，我們重複地說，這正足以證明俄國社會主義的政黨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能在自己的擁護者中間激起思想上緊張的活動和強烈的信念的黨，是一個不甘心把熟記的公式當做教條來信仰的黨”。

我不明白在這一聲明上署名的編者，何以會不高興地看待一個他所認為和“民意”的意見分歧“不太大”（“民意導報”，第二期，第二部分，第六五頁，倒數第十行）的集團的文章；我也不能容忍，登載這一聲明的雜誌竟會仇視那些“不甘心把熟記的公式當作教條來信仰”的人。我們不能認為原來要寫以上所引的一段話，只是為了向讀者解釋“‘民意導報’所提出的綱領，包括某種程度上彼此不完全一樣的一些觀點”（“民意導報”發刊聲明，第七頁）。同時也不能假定“民意導報”為自己定出這樣一個“確定的綱領”，只是當“俄國社會主義者中間比較顯著的分歧”，“不超出”這一綱領“包括某種程度上彼此不完全一樣的一些觀點”的“範圍”時，才承認它們的重要意義。這等於說，只有對於自己“教會”裏的分子才是可以容忍的，正如謝德林小說中的主人公們一樣，他們承認反對派只是在不為害的時候才是無害的。從這樣的自由主義、這樣的寬容，俄國的一切“非國教”社會主義者是感覺不到什麼安慰的，而他們現在顯然不在少數，因為在您的評論中也說“這些派別認為它們和‘民意’論戰更合時宜”等話。從這些話裏可以看出，這類派別至少有兩個，而“想做俄國全體社會主義革命家統一機關報”的“民意導報”，迄今為止還根本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我以為這樣的挫折應當使“民意導報”的編輯部放寬而不是縮小自己容忍的範圍。

您勸我不要“破壞”我們革命軍隊的“組織”。但是，首先，我請問您，您所說的是哪種“社會軍隊”呢？假使您把這一“社會軍隊”的譬喻了解為“民意黨”的組織，那末，我從沒有想到我的小子會對它起破壞作用，而且相信您第一個問到的民意黨黨員，也會勸您在這一點上放心的。假使您把“破壞社會軍隊的組織”了解為把那些由於某種原因還站在“民意黨”外面的人們吸收到我們集團裏來，那末，這樣的吸收對於“社會軍隊的組織”只有好處，因為在這“社會軍隊的組織”中間出現了（比方說新兵所組成的）新部隊。此外，從什麼時候起，把關於某種軍隊所走的道路的討論，關於相信另外有一條更快和更可靠地達到勝利的道路的表示，認為是“破壞這一軍隊的組織”呢？我以為只有在亞細亞專制國家的烏合之衆中才能有這樣概念的混淆，而在現代文明國家的軍隊中是絕對沒有的。誰不知道，對於某種軍隊所採取的戰術的批評，所能損害的當然只是這支軍隊將軍們的軍事聲譽，這些將軍們大概不反對把那些不謙虛的人的嘴“封住”。但是這與“軍隊的組織”有何相干呢？而且軍隊的統率者又是誰呢？您知道，這些統率者不外為士兵所選，或由上級所派。姑且假定執行委員會扮演我們革命軍隊的統率者的角色。試問，那些沒有參加過選舉的人對他是否有服從的義務，而如果他是由上級所派，那末，誰有這種指派的權力，而且又是什麼樣的權力呢？

您把我們的集團列入那些“認為和‘民意’論戰比對俄國政府、對俄國人民的其他剝削者作鬥爭更合時宜的俄國革命社會主義的派別之內”。我請問您，您是否認為俄國人民和“當前歷史時機”的一個特點，就在於“對俄國人民的剝削者的鬥爭”無須傳播表現這一鬥爭的意義和趨勢的那些思想，也可以進行呢？如果沒有在一定

的社會階層中間傳播最先進、最健全，總之最革命的和概念，革命運動的發展是不可思議的，這個道理，難道需要我這一過去的“暴動派”向您，“前進”雜誌的前任編輯證明嗎？像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表現的，社會主義是對人民的各種剝削者進行鬥爭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這一事實，還要您注意嗎？而我的同志們的目的，如“現代社會主義叢書”的發刊聲明所明白表示的正在於宣傳這兩位作者的學說。說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和我們一般革命運動中，尤其是如“民意黨”中“所表現的俄國社會主義”大不相同，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俄國社會主義”直到現在，背後還拖着一條很長的巴枯寧主義的辮子。說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因此對於俄國社會主義的某些“熟記的公式”，往往不得不採取否定的態度，——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很自然的；但是由此還絕不能說，他們寧願作反對革命者的鬥爭而不作反對政府的鬥爭。在“民意導報”上，有一位塔拉索夫先生堅決地駁斥了馬克思歷史理論的基本原理之一*。塔拉索夫先生的論文登在“民意導報”第二期第一版所謂頭條的地位。這是否說，塔拉索夫先生認為，反對馬克思的論戰“比對俄國政府、對俄國人民的其他剝削者作鬥爭更合時宜”呢？難道論戰在杜林派、巴

* 我還希望在塔拉索夫先生的論文登完之後，再來和他討論。現在我覺得，塔拉索夫先生既完全不懂馬克思，又不懂馬克思的“門徒”，他所天眞地進行的論戰，實質上反對的是小有產者喬治·廢林納里，而絕不是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卡爾·馬克思。同樣，塔拉索夫先生的“方法”也使我不解。可敬的作者的這一方法顯然是從資產階級的科學裏，即是已經被他“在‘導報’第一期上不可辯駁地證明為‘破產’了的科學裏剽竊來的。正如資產階級作家們為了證明自己的‘自然法則’，通常總是想出一些除了幻想‘儲蓄和積累資本’以外，不消說就沒有別的想頭的‘野蠻人’一樣，塔拉索夫有意地忽視現代人種學的資料，也想出一些顯然是布朗基主義者的和只求‘奪取’支配自己鄰居的‘政權’的‘野蠻人’。這樣一種獨特的歸納法勢必也要把塔拉索夫先生的杜林式的社會主義‘科學’引向完全‘破產’的地步。

枯寧派、布朗基派分子們的筆下，便是適當的和“合時宜的”；而只要馬克思主義者一出來發言，就變成對俄國革命尊嚴的侮辱嗎？一個多次聲明贊同馬克思理論的作者竟有這樣的態度，這是對的嗎？或者說，這是可以說明的嗎？

我很知道，從馬克思理論的觀點來解決我們革命黨的任務問題，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理論的基本原理，老實說，只是三段論法中的“大前提”，因此，同樣承認這第一個前提的正確性和偉大科學意義的人，彼此之間的結論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那是要看他們如何理解第二個前提即“小”前提，即是說要看他們如何估計俄國當前的現實而定。所以，我對於您之不同意我們的綱領，一點也不驚異，不過我以為您如果仍不失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話，就不能向我“證明”，“我的”綱領中所有“缺點和不切實際的地方”，比我所“非難民意黨”的要多得多。但是在目前俄國現實的估計上的意見多麼分歧，對我及我的同志們都說明不了您在您的評論中對我們所取的那種態度是不公正的。

我現在要請讀者來主持公道。在“民意導報”編者的書桌上有兩本“勞動解放”社出版的小冊子。一本是恩格斯著作的譯本，可敬的編輯稱之為“最近幾年社會主義文獻中最優秀的著作”。

第二本小冊子，據同一編輯說，其中一部分值得“像對一切有關社會主義問題的重要著作那樣地予以注意”。另一部分包括“反對‘民意黨’過去和現在的活動的論戰”，論戰的目的在於向民意黨證明，“民意黨既以自己的實際活動給了正統民粹派的全部傳統以致命的打擊，並且為發展俄國的革命運動做了這樣多的工作，因而它除了在現代科學社會主義中找根據之外，就不應當在別的地方找根據”。而勞動解放社一部分出版物中的這一部分，在“導報”的編

者看來，是證明該社幾乎專以“反對民意黨的論戰”爲目的，而爲了這一目的不惜放棄對政府的鬥爭。讀者只要稍爲公道一點，一定同意這樣由局部到全體的推論是這一全體的其他部分的性質所不能證實的。

我不否認自己小冊子的“一部分”的論戰性，或正確些說，批評性。但是小冊子、甚至它的被指摘的那一部分不是專以反對民意黨的論戰爲目的，這已經可以從那一爲您，彼得·拉夫洛維奇所忽視的情形看出，即是說我的批評並不限於俄國運動中的一個民意派時期。我在那裏也批評了運動中的其他派別。而假使從我的已刊載的、並且說明了何以不同意這一或那一革命綱領的理由的文章中得出結論說，反對這一綱領的論戰，是我寫文章的主要目的，那末，爲了符合事實，應當把對我的責難更加擴大。應當說，爲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主義者、舊民粹派、民意派，以及反對那些“不了解政治鬥爭在無產階級解放事業中的重要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進行的論戰，乃是我寫文章的主要目的。此外，還應當注意到，“普列漢諾夫先生的小冊子的另一部分是述及關於論證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哲學及歷史方面的。”於是明白的，我的罪過似乎在於傳播我所信仰的那些革命見解，在於我和那些我認爲錯誤的人論戰。但還不止於此。在慎重考察全部情況以後，也許可看出我的罪過是照着“早打好的主意”做的，因爲還在“現代社會主義叢書發刊聲明”中我和阿克雪里羅得已經坦白地聲明，我們叢書的任務在於：

（一）把馬克思恩格斯學派的最重要著作以及爲不同教育程度

* 參閱“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俄文版單行本，第二〇頁。

的讀者所寫的原著譯成俄文，來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

(二)從科學社會主義及俄國勞動人民利益的觀點，批判我們革命者中流行的各種學說，和探討俄國社會生活中的最重要問題。

這就是所以引起您不滿的“行爲”的實質。如果要對作這種活動的人給予那怕是非常輕微的責難，就應當首先證明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必要來批判流行在我們革命者中間的綱領和學說，或者證明，這一批判應當變爲——如別林斯基某一時候（自然是就別一問題）所說的——“權威的恭順僕人，陳腐議論的諂媚的重複者”。但是我已經說過，恐怕難以找出一個作家敢於擁護這樣一個前所未聞的主張，而絕不致於是您，可敬的彼得·拉夫洛維奇會出來說：現在是我們的革命黨“滿足於把熟記的公式當作教條來信仰”的時候了。假使是如此，那末

Wozu der Laerm? (爲什麼還激烈爭辯呢?)

許多人雖然不敢完全否認批評在我們革命出版物中的重要性，但是總以爲，不是每個人，不是每個個人組成的集團有權利批判“行動的黨”的學說和策略的。

從我的“小冊子”出版以後，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這類意見。“行動的黨”有意義的傳統、“英勇的鬥爭”，這些話都是用來對稍微觸犯我們革命信條中“熟記的公式”那種恐懼心理加以遮蓋而已。我有不同意“民意黨”的權利，或更正確些說，有不同意它的言論的權利，但這一權利却完全不管誰是誰非，不管是我對還是“行動的黨”的政論家們對而被否認了。當我聽到對我的“小冊子”這類的抨擊時，我不禁想起：“沙拉曼克的學士”伊尼戈一與一美得洛佐一與一康波弟奧士一與一帕帕拉米恩多先生在有名的 Controverse des mais (用“但是”進行的辯論)中的論據。這一辯論家說：《Mais

monsieur, malgré toutes les belles choses que vous venez de me dire, vous m'avouerez que votre église anglicane, si respectable, n'existait pas avant dom Luther et avant dom Eccolampade; vous êtes tout nouveaux: donc vous n'êtes pas de la maison!»（“但是，先生，不管您所說的一切是多麼漂亮的東西，您必須承認，你們如此可敬的英國國教教會，在路德先生以前，在愛柯蘭巴德先生以前並不存在；您完全是新進，所以您不屬我們的一家！”）

而我自問：難道偉大的諷刺家對於他的最兇惡的敵人所暗示的論據可以為俄國革命者們認真地應用嗎？難道天主教的“學士”的諷刺畫成了革命團體出身的俄國辯論家的精確素描嗎？可敬的彼得·拉夫洛維奇，您應該同意，沒有比這種情景更可悲的，關於“組織”之是否完整的任何憂慮，比起這種可怕的智力衰退的憂慮來，是沒有絲毫意義的。

最堅決地阻止我們的革命宣傳淪為革命的煩瑣議論，也是對民意派有益的。然而，可敬的彼得·拉夫洛維奇，您的評論寧可說是在支持，而並不是在削弱我們革命的“學士”們的熱情。您所表示的，“可以破壞這一革命軍隊的組織的，也只限於或者是這一軍隊的事業上的敵人，或者是一個靠自己的活動、自己的力量和組織，在當前歷史時機能成為社會軍隊的集團”的這一信念，以及您關於我們的集團“要起這樣的作用，還在遙遠的、而且大概有點成問題的未來”的說法，都可以成為如下結論的藉口，那就是，據您的意見，彷彿我們的集團“就其年齡上”說，雖然可以“具有自己判斷的膽量”，但是如果它和“民意黨”的這個或那個期刊編輯部的意見相抵觸的時候，它就應當極力保持緘默。不消說，從您所說的話做這樣的結論也許不正確，但是不應忘記，人們並不經常都是照着嚴格

邏輯的一切規則來議論的。

在剛才所引用的幾行中您所說的原則，可以引起許多可悲的誤會。這幾句話對於那些“非國教信徒的讀者”可能成為完全“不合時宜”的警告。這幾行可能引起讀者們大致如下的想法：能成為“當前歷史時機的社會軍隊”的集團，是可以“破壞我們革命軍隊的組織”的。而革命的軍隊，作為有功勳和有鍛鍊的軍隊，更“可以”“破壞”那些“思想不同”的集團的“組織”，而這些集團的領導權，在這個社會軍隊看來，還是很遙遠的事情，“而且”還是“大概有點成問題”的事情。“民意導報”的編輯部承認哪一個革命派別是社會軍隊呢？大概是承認“民意黨”自己。這是說……但是結論是清楚的，而且對於像我們這些直到現在都以為可以批評別人的見解而不能“破壞”別人的組織，最好同他們“並肩”而行，相互支援，相互補充的集團，結論是極為悲慘的*。

您覺得我們集團的未來是值得懷疑的。我自己也準備對它懷疑，因為問題在於我們這樣的一個集團，而並不在於它所代表的意見。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

我們的革命運動現在是在危急的時期，這是誰都知道的。民意黨的恐怖主義策略在我們的黨的面前提出一系列極為現實和極為重要的問題。但是可惜，這些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我們這裏流行的關於巴枯寧主義派和蒲魯東主義派的理論知識，甚至用來正確地提出這些問題也是不夠的。從前向一邊彎曲的拐杖現在彎向另一邊了。從前是毫無根據的對“政治”一味地否定，現在又是同

* 參閱“現代社會主義叢書”的發刊聲明，第二二頁註。